



今年春节，故宫博物院举办了建院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游客们在近千件文物中感受清代皇家过年情景，在百余家中老字号的诸多非遗绝活、传统小吃里感受浓浓的年味。

然而同样是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的热闹相比，许多高校博物馆却格外冷清，因为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在春节期间闭馆。这不仅让很多带孩子去大学“寻宝”、感受学术氛围的家长颇为失望，也引起公众对高校博物馆是否应该在假期开放的讨论。

实际上，高校博物馆在假期闭馆的情况早已是“惯例”，而且因此，人们还常感叹它“养在深闺人未识”，以至于很多人并不晓得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一张文化名片

“一般来说，高校博物馆的范畴并不仅仅局限于各类高校的博物馆，还包括艺术馆、陈列馆、展览馆、标本馆以及纪念馆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副秘书长蔡劲松表示。

他认为，从文化视角看，高校博物馆是高校文化系统的重要表征，是一部融思想性、创造性、知识性、文化性和服务性于一体的“立体教科书”；从机构属性看，它依托大学而存在，具有涵盖领域宽广、学科专业性强、学术研究实力雄厚、馆藏丰富等特点，不仅是高校教育实践平台，更是公共文化传播机构；从职能看，它还具有专业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和学科传承、科学人文精神普及传播、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等重要功能。

高校博物馆的建立，是以高校的文化创造、学科优势和文物、标本、资料等实物藏品积累为前提的。而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都有一种鲜明的精神文化与境界贯穿其整个发展历史，都拥有一座或多座内涵丰富的博物馆，比如哈佛艺术博物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等。

“就如同公共博物馆是展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橱窗’和‘文化名片’，高校博物馆也是高校展现给社会的‘文明橱窗’和‘文化名片’。”蔡劲松说。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近200家高校博物馆，其中不乏藏品丰富、颇具特色的博物馆。

比如国内高校中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其前身是1922年北京大學设立的考古学研究室，现收藏的数万件藏品，涵盖了石器、铜器、甲骨、陶瓷、瓷器、书画、碑帖等几大类；再如我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其前身是1914年开始筹建的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现有文物53000余套/84000余件，包含石刻、书画、陶瓷、青铜器、古钱币、古印、刺绣、漆器、拓片等几十个门类；又如我国首个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的综合科技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博物馆，珍藏了30余架新中国成立前的美、苏等国飞机和导弹，特别是“黑寡妇”战斗机，世界仅存两架。

诸多开放难题

不过，让人感到可惜的是，高校博物

高校博物馆：养在“深闺”几人识

■本报记者 王之康

高校博物馆不能养在“深闺”，而是应该“不断开拓视野，以全球化视角有针对性地制定自身运营策略与发展对策，全面实现向公益性开放、向学术型增强、向资源性拓展、向综合性深化、向国际化互动的现实选择与发展趋向”。

馆在客流量方面却不尽如人意。

比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16年9月11日到2018年10月29日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接待观众约99万人次，这对于一座高校博物馆来说并不算少，但与公众博物馆比起来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要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仅在今年2月6日一天就迎来了近7万名观众，2017年全年参观人数则超过了800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尚未形成参观博物馆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高校博物馆对外开放不足。

记者随机检索了多家高校博物馆，其中，仅有少数是除夕至初六闭馆或除夕至初十闭馆，多数则是在整个寒假期间都不对外开放。至于其他法定节假日或高校暑假，闭馆也就更加常见了。

“从欢度佳节角度来看，高校博物馆出于学校管理的原因，在春节假期闭馆无可厚非，但从向社会开放、服务公众角度来看，如果可以在春节等假期开放，无疑能给民众提供更多选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对社会公众来说，假期正是到高校参观的最佳时机，很多人都想进高校博物馆看看特色

珍藏，尤其是家长，也想借此培养孩子的专业兴趣。

蔡劲松也认为，更多地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并致力于成为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的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应该是博物馆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高校博物馆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独特的文化景观，它在传播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智识教育等方面，无疑具有潜移默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功能得以拓展，服务已经超越了大学围墙，渗透到周边乃至更广阔的社会中。”

对于假期开放博物馆一事，某高校博物馆馆长邹若珩也深表赞同，但他却向《中国科学报》表露出诸多苦衷：“最直接的共性问题就是，职工放假，如何有效协调充足人手以确保游客的参观体验？开放参观，带来的校园安全管理问题怎么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考虑在内。”

“长期以来，基础条件、管理机制等方面的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高校博物馆的开放。”他进一步解释称，一般的高校博物馆都缺乏健全的职能设置，管理

模式也没有统一规范，对员工的管理停留在对待一般行政、教辅人员的传统经验管理上，较少考虑到博物馆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人员的专业特殊性；同时，运营经费短缺也是一大问题，资金来源途径少，多数为“以校养馆”模式，经费得不到保障，导致各方面工作的停滞乃至事业拓展面临局限。

探索长效机制

对于高校该如何在假期开放博物馆，熊丙奇认为，应该探索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比较适合的办法是，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负责整合高校博物馆资源，再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熊丙奇说，高校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开放这一部分，可以纳入公共博物馆管理，这样既可促进博物馆资源共享，也能更好地发挥博物馆促进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总而言之，丰富的高校博物馆资源不能藏起来，各具特色的高校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开放，会增加公众的选择，也有助于树立大学形象，传播大学精神，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

同样，蔡劲松也认为应该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不过，他将着眼于高校如何实现转型发展，进而扩大开放程度上。

“高校博物馆必须突破管理方式陈旧的瓶颈，建立适应未来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他表示，具体来说，就是着重统筹顶层布局与组织优化、品牌战略与形象塑造、人才支撑与专业素养以及精细管理与评价反馈四个方面的优化管理维度。

比如，在顶层布局方面，高校博物馆应该不断更新建设理念，通过视野拓展和管理创新，特别是通过理顺与整合博物馆的组织构架，以破解现有体制的局限。志愿者服务力量、高校博物馆联盟等外部组织，如果作用发挥得当，将为高校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赢得丰厚的外部资源。比如设立高校博物馆发展基金、弥补高校博物馆人力资源不足并形成其良性发展的外围志愿者力量等；同时，其内部职能部门也应进行局部优化与整合，从从业人员进行一岗多责的职责定位，以精细化的管理将某些业务功能合为一体。

而在逐步理顺高校博物馆内部运营管理机制、提升现有层次与水平的过程中，蔡劲松认为，要着力解决其文化性、公益性服务主线和市场拓展的关系。

“高校博物馆应扩大开放程度，要加强经营探索，增强自身发展的造血功能，结合校园和博物馆文化衍生品开发、校园旅游等活动，自主拓展经营项目。”他说，不妨参照国外博物馆的管理机制，尽可能通过董事会、理事会等形式，争取社会力量筹措资金、捐赠藏品，吸引更多经济组织、专业团队和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博物馆运营管理，探索项目合作机制，形成博物馆发展的良性循环。“此外，也应注重建立有效的高校博物馆评价机制，把建设和运营管理成效，纳入社会博物馆协作网络、质量监控体系及行业评估。”

总之，高校博物馆不能养在“深闺”，而是应该“不断开拓视野，以全球化视角有针对性地制定自身运营策略与发展对策，全面实现向公益性开放、向学术型增强、向资源性拓展、向综合性深化、向国际化互动的现实选择与发展趋向”。

风物



1957年竣工的主楼主体

一提到电子科技大学的校园建筑，有一座楼是几乎无法绕开的话题，那就是该校老校区主楼。这座1957年建成的老楼，当时还是成都体量最大的单体建筑，到现在仍是成都东城区的地标式建筑。因其造型独特，带有时代印记，也成为了成都市有代表性的苏式建筑。

时光回溯到1955年5月，当国务院决定在四川省建立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时，教学主楼作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被推向了历史前台。

当时，四川省政府把成都市府青路以东、沙河以西的保和乡一片地方（即现在的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作为校址。学校主楼终于在一片稻田里开工建设。

主楼本来打算建七层，但因成都地下水位高、地基不牢，最后只建了五层。其风格样式是仿照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院”教学主楼设计的，相当厚重、大气。主楼门廊设计了八个高大拱门，地下室设计了防空洞，楼内部的所有大教室都要求装置活动黑板，且全部采用玻璃黑板，所有教室必须做成斜坡，其中，物理及化学实验室附近的两个大教室必须做成阶梯教室，供示范教学使用。这些设计无不体现着以学为本的用心。

根据工程进度，1956年元月底，工程要完成地质勘探，3月10日开工，8月20日前，楼体的全部工程都要竣工。但在实际施工中，只有地质勘探和现场准备工作基本按期完成，主楼在当年4月11日才开始破土动工。施工过程中，施工方又遇到种种没有预料到的状况，甚至造成了好几次不必要的返工，一再推后竣工时间，直到1957年上半年，主楼的全部房屋建筑工程才得以完工。虽然没有按时完工，但就当时的基建水平而言，仅一年多就完成了26000多平方米的房屋修建，速度之快，难以想象。

随着工程的推进，原材料的供应日趋紧张，每天仅红砖就需要5万多块，而成都附近不能生产红砖，所用红砖需从内江等地运来，一时供不应求。为解决工程之急，当省、市政府决定拆除成都市和附近县份的城墙取砖，教学主楼的底层就是用成都市附近县份的城墙砖叠砌起来的。砖外墙原本设计为清水墙，但7月份的一场大雨，使外墙面被水泥砂浆涂花，严重影响了主楼外观，学校向施工方提出，待砌墙工程全部完成后，清除墙面污泥，并涂刷一层红色，最后再用砂浆勾缝。

1957年上半年，主楼房屋建筑工程竣工，成都东郊耸立起一座雄伟庄

重的苏联风格的大楼。

开学后，师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学校建设，主楼的水磨地板就是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磨出来的。首批在主楼上课的学子最初在教室在主楼东，据多位老教授回忆，当时教室里还没有安装桌椅板凳，学生们就拿着小木板坐在阶梯地板上听课。主楼未修好的教室曾被用作师生的临时宿舍，双层床架在尚未铺设水泥地板的黄土泥地面上，环境潮湿阴冷。直到1957年上半年，主楼和宿舍房屋建筑工程竣工后，老师和学生的生活条件才得以改善。

作为电子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副博士”，刘盛纲来到学校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1日。当他看到眼前那座雄伟壮丽、庄严肃穆，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建起来，有着“全国高校第一楼”之称的主楼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2002年9月，饱经沧桑的主楼重新焕发出现代化的气息。2001年11月，学校对主楼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改造，包括外墙装修、内部装修、更换门窗以及线路、管道、厕所的改造。2002年2月，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当年9月改造完成，形成了一座独特的苏式风格建筑。

2009年1月，总建筑面积达81350平方米，比老校区主楼大两倍的电子科技大学新校区主楼拔地而起。新主楼内部设计和原主楼迥然不同，它融合了现代特色并进行了创新，但其文化内涵和体貌风格却传承自原主楼。厚重、大气、典雅的新主楼代表的是成电人对原主楼的回忆，以及对老成电精神的发扬光大。新主楼作为后起之秀，2010年11月获得中国建设工程最高奖——“鲁班奖”，之后又入选我国“改革开放35年百项经典精品工程”，成为全国32项“精品工程”之一。

时过境迁，老校区主楼已有63年历史，走出了林为干院士、刘盛纲院士、李乐民院士等众多卓越人才，他们的足迹也深深地印在了主楼的每一个角落。新校区主楼今年也正好10岁，两座主楼，一脉相承的都是“求真务实大气大为”的校训精神。

新时代、新征程，两座主楼必将见证更加精彩的“成电篇章”，以及成电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铿锵步伐。

史海钩沉

交大西迁背后的人和事

伴随着第一批西迁人润物无声的感染与影响，越来越多的交大人沿着先辈走过的足迹，步履铿锵，足音响亮。

秦岭一片白云飘，关中平原真富饶。周秦汉唐是古都，工业重镇在今朝。交大西迁任务重，西安建校热情高。文教适应工农业，经济建设进高潮。

1957年9月的一个早晨，陈学俊站在西安交通大学东门远眺秦岭，写下了这首《迁校有感》。这一年，他和夫人带着4个孩子乘坐第一批载有交大教师的专列，由上海来到了西安。临行前，他将上海的两处房产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的决定，时年38岁的陈学俊就是交大西迁的大军中年龄最年轻的教授。他和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一起，告别了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国家建设、为西部文教事业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

“心系祖国”的爱国精神

1955年5月25日，时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交大西迁之时，彭康已步入天命之年，却以非凡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力，

完成西迁使命。在对迁校问题发表意见时，他开宗明义：“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考虑”。

短短数语，道出了老校长心系国家发展、为人民办好教育的真切情怀。而他的这种情怀，也在交大众多教职员工的身体上得到了体现。

在迁校时，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著名电机工程专家、电机工程教育家钟兆琳已经57岁。他婉拒周恩来总理考虑他年龄比较大，夫人需卧床养病，可不必去西安的照顾，孤身一人前往西安。他的感人事迹，在西安交大师生中口口相传，称颂至今。

在钟兆琳精神的感召和带动下，他所在系的绝大多数教师都迁至西安。来到西安后，年近花甲的钟兆琳不辞辛劳、事必躬亲，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将西安交大电机系扶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使之逐渐成为国内基础雄厚、规模较大、设备日臻完善的高校电机系。

值得一提的是，钟兆琳并不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依然旗帜鲜明地拥护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坚决拥护学校党委的决定，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体现了

崇高的家国情怀，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颂歌。正如他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教师都有责任。”

“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

直到今天，83岁的西安交大教授潘季还清楚地记得，老一辈交大人当年满怀憧憬和希望，在西去的列车上唱着歌兴高采烈的场景。“6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吸引我的是为国家建设而拼搏的火热生活，是开拓、创造、创新所带来的快乐。”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佞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这首创作于1957年的《忆江南》，道出了无数西迁交大人的心声。这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词作者，便是西迁而来的沪上名医沈云扉。他以66岁高龄来到西安新校的小什里为师生服务，一干就是8年。

“我已经在西安交大工作61年了，回顾迁校的那段经历，还是热血沸腾。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的富强不顾一切去奋斗的精神。”西迁教师、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谢友柏回忆说。

当时西安的条件十分艰苦：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用水非常紧张。建校初期，野兔在校园草丛中乱

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嚎。冬天教室仅靠一个小炉子取暖，洗脸水得到工地上去端……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总务处长林林作为学校后勤事务的迁校带头人之一，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义无反顾地偕夫人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学典礼上，陈大燮说：“我是交通大学包括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被学校授予“终身教授”的赵富鑫同样在1956年随校西迁，一去便扎根西安43年。他一生从事大学物理教学，研究近70年，为交大物理基础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老交大“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教学传统的建立，以及中国大学物理教材的编写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傅景常回忆：赵先生授课“滚瓜烂熟，无书不稿，只发讲义，一边滔滔不

“无私奉献”的标杆精神

1956年，刚到西安的教师们顾不上

休息，一下火车就忙着筹备开学。9月下旬，新学期正式开始，一切却井井有条。“这就是交大人的品质，没有因迁校而延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和实验计划，堪称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交大老教授陈听宽自豪地说。

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课比天大的教学理念，都高度体现了交大西迁者对其工作的热爱，以及对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热忱与期待。

我国热力工程学界先驱陈大燮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义无反顾地偕夫人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学典礼上，陈大燮说：“我是交通大学包括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据傅景常回忆：赵先生授课“滚瓜烂熟，无书不稿，只发讲义，一边滔滔不

绝地讲，一边笔走龙蛇地写板书，刚写满两块黑板，即闻下课铃响，每次上课差不多都是如此，其掌控授课的时间竟如此准确。”同时，赵先生协同著名物理学教授袁维裕、周铭进行基础物理课程的设计、教学和实验改进，为交大老传统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伴随着第一批西迁人润物无声地感染与影响，越来越多的交大人沿着先辈走过的足迹，步履铿锵，足音响亮。

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庄德回忆西迁教授们艰苦奋斗的往事时，感叹至今历历在目，“我的导师赵卓贤教授指导我从几何量测量开始从事科研工作，当时他有病在身，还一直坚持认真修改我的论文；已故的屈聚生院士当时家里冬天还点着炉子，雪夜约我到家里长时间讨论动态数据处理……”

“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传承西迁精神，就是要传承好这些老师的精神力量 and 无私奉献。我们常说不忘初心，就是要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杰出的人才，将西安交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些正是我们接好接力棒、为之不断奋斗的前进动力。”蒋庄德深情说道。

（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通讯员张砾琦根据西安交大西迁史料整理）